

春秋晚期吴越冶炼民俗刍议

顾希佳

(杭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 从《吴越春秋》中两段文字记载出发, 认为春秋晚期吴越一带冶炼生产中存在着“人殉”和“衅”这样两种民俗事象。进而探讨这两种民俗产生的渊源和后世流变, 并指出造成这两种民俗的地域文化背景。

关键词: 吴越文化; 民俗; 人殉; 衅

中图分类号: K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293/Z(2002)05-0056-05

春秋晚期, 吴越一带的铜铁冶炼业十分发达。《越绝书》卷11专述“宝剑”, 其中提到“吴有干将, 越有欧冶子, 此二人甲世而生, 天下未尝有”。干将和欧冶子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 早就有学者表示怀疑。有人认为, 干将可能是指干国的工匠, 欧冶子可能是指瓠地的冶匠^[1], 有一定道理。然而即使作为传说, 也至少可以说明春秋晚期吴越一带的冶炼业已是相当发达。通常还以为干将铸剑在今浙江德清莫干山, 欧冶子铸剑在今浙江龙泉。上述二地不仅留下了有关他们铸剑的若干遗迹, 更有若干个优美的传说广为流播。文物遗存则有闻名遐迩的越王勾践剑出土传世。经现代科学技术检测, 认为这把剑各部位的元素含量各不相同, 当是采用了复合金属工艺, 而世界上其他国家要到近代才开始使用这种工艺。由此可见, 春秋晚期越国的冶炼业不但在神州大地名列前茅, 而且居于世界领先地位。^[2]

普列汉诺夫说:“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 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 必须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 对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 对思想体系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3]此说甚是。据此, 本文拟就春秋晚期吴越冶炼生产中的民俗事象及其文化心理有所寻觅。

鉴于民俗文化主要指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

心理, 仅从物质文化遗存较难作出准确推断。本文拟从典籍出发, 并结合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田野作业所得的“活化石”材料, 加以探寻。

—

《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 记述了一则干将夫妇铸剑的传说, 说越国此前向吴王阖闾献了三把宝剑, 阖闾非常珍爱, 命干将、莫耶夫妇再为他铸两把。又说干将和欧冶子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铸剑名匠。干将铸剑, 便引出下面这个传说:

干将作剑, 采五山之铁精, 六合之金英, 候天伺地, 阴阳同光, 百神临观, 天气下降, 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于是干将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为剑闻于王, 使子作剑。三月不成, 其有意乎?”干将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 须人而成。今夫子作剑, 得无得其人而后成乎?”干将曰:“昔吾师作冶, 金铁之类不消, 夫妻俱入冶炉中, 然后成物。吾今后世, 即山作冶, 麻服, 然后敢铸金于山。今吾作剑, 不变化者, 其若斯耶?”莫耶曰:“老师亲炼身以成物, 吾何难哉?”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囊装炭, 金

收稿日期: 2002-05-20

作者简介: 顾希佳(1941-), 男, 浙江嘉善人, 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研究员。

铁乃濡,遂以成剑。

这是一则传说,不能当作史实,但传说又往往会艺术地反映历史的本质方面。从这则传说,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春秋晚期的吴越一带,冶炼工匠铸剑时是有过许多祭祀仪式和巫术行为的。他们一方面固然依靠实实在在的科学技术知识,才得以冶炼出令后人惊叹的宝剑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仰仗于鬼神信仰和超自然力量,用以保障冶炼的成功。在上述传说中,莫耶的行为可以有两种译法:一说,莫耶剪下自己的头发和指甲,投入炉中,也就是说她是用头发和指甲来代替自己的身体,投炉作为牺牲;一说,莫耶剪断头发,剪光指甲,以示洁净,然后投身炉中以为牺牲。在唐代陆广微的《吴地记》中,也记载了这则传说,则采用了后说。不管莫耶究竟怎么做,总之她是以投身熔炉作为“人殉”的代价,才换来了铸剑的成功。

除此之外,这则传说还告诉我们,春秋晚期吴越一带铸剑时,工匠们要系着麻制的丧带,身穿茅草衣,犹如参加丧葬礼仪那般,才敢进山操作。也就是说,工匠们都早已作好准备,随时会为了铸剑而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至于在整个冶炼过程中还有哪些具体祭祀仪式和巫术行为?《吴越春秋》未作交代。

有关“人牲”和“人殉”的民俗事象在古代确实多有发生。文化人类学为我们提供过不少这方面的例证,我国古代典籍对此也多有记载。产生于史前的“人牲”,后来大致表现为血祭地母、猎头祭谷、杀长子和初生儿作为奠基牲这样三种形式。^[4]如著名的“汤祷雨”,就是古代部落首领自焚以求雨的记载,郑振铎先生早有论述。^[5]《左传》等典籍还有“焚巫”、“暴”一类的文本记载,都说明古人在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或是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时刻,就会用人来作为牺牲,以求得鬼神的宽恕和佑助。冶炼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工艺,比起同时期的木工、泥工等行业来,更增添一层神秘外衣,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意外也更多一些,由此出现“人牲”和“人殉”,是可以理解的。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在新几内亚东北的梅兰内西亚人中间,有着两个划分清楚的领域:“一方面是一套谁都知道的天然条件,生长底自然顺序,一般可用篱障耘芟加以预防的害虫与危险;一方面是意外的幸运与坏运,对付前者是知识与工作,对付后者是巫术。”^[6]在冶炼生产中自然也是如此。离开了科学技术,古代冶炼生产不可能出现如此辉煌的成就,但是,当运用世代相传的生产经验和科技知识以及个人的聪明才

智还无法解决冶炼中所出现的困难时,工匠们势必会想到鬼神,想到某种超自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以身投炉作为牺牲的壮烈行为便认为是最佳选择。

作为传统习俗,我们还可以在后世的典籍记载和口头传说中看到“以身投炉”所留下的历史轨迹。

三国吴的时候,又有“孝娥投炉”的传说,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5,说贵池县有孝娥庙,“吴大帝时,孝娥父为铁官,冶遇秽,铁不流。女忧父刑,遂投炉中。铁乃涌溢,流注入江。娥所蹀履浮出于铁。时人号圣姑,遂立庙焉。”

明代,朱国祯《涌幢小品》卷4记载了河北遵化的一种说法,说遵化铁厂的炉长长康侯“当炉四十日而无铁,惧罪欲自经,二女劝止之,因投炉而死。众见其飞腾光焰中,若有龙随而起者。顷之,铁液成。元封其父为崇宁侯,二女遂称金、火二仙姑,至今祀之。其地原有龙潜于炉下,故铁不成。二女投下,龙惊而起,焚其尾,时有秃龙见焉。”从行文看,这个传说至迟发生在元前,否则也就没有封诰祀奉之说。传说有发展,加入了“秃尾龙”母题,但核心情节依然是“以人祭炉”,而且投炉人总是个女子。

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又记有一则广东传说,文云:“铁矿有神,炉主必谨身以祭,乃敢开炉……其神女子。相传有林氏妇,以其夫逋欠官铁,于是投身炉中,以出多铁。今开炉者必祠祀,称为‘涌铁夫人’。”

北京、南京也有类似传说流播。元明清时,北京鼓楼西有铸钟厂,又称华严钟厂,那里就有一座铸钟娘娘庙,祀奉铸钟娘娘,又称金炉娘娘。民间传说,铸钟娘娘叫华仙,其父铸钟,屡铸不成,为救其父,华仙跳入炉中,钟遂铸成。又说,从此以后,此钟的声音酷似“鞋”音,人说乃是此女孩向人索要她的鞋子。有关“鞋子”的母题,其实早在三国吴的“孝娥投炉”传说中就已经出现了。由此,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个传说流变的轨迹。

在南京,清代甘熙《白下琐言》载:“相传铸时屡不成,督工者将获谴,有幼女伤父不免,投身火中以殉,遂为钟神。”

在浙江桐乡乌镇,直至近现代还保留着“请锅神”的习俗。当地铸铁锅作坊在每年春节后开炉前,必在炉前祭祀锅神。当地传说,一老工匠因不能如期完成铸大鼎锅之圣命而心急其焚,其女秀姑为救老父,跳入炉中,鼎锅遂成。于是,当地铸铁锅工匠祀奉秀姑为锅神,形成了“请锅神”习俗。

[7]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传说中“以身投炉”的人一概都是女子,这是否与“莫耶投炉”有关,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这种原先在冶炼业流行的习俗和传说后来又扩布到了陶瓷和烧炭等行业,陶瓷窑和炭窑的温度之高,与铜铁冶炼有相似之处,都离不开熊熊烈火,这种习俗和传说的扩布也就显得十分自然。在景德镇,清乾隆《浮梁县志》卷4载清雍正年间唐英撰《火神传》,文云:“神姓童,名宾……万历年间,内监潘相奉御董造,派役于民。童氏应报火,族人惧不敢往,神毅然执役。时造大器,累不完工,或受鞭捶,或苦饥羸。神恻然伤之,愿以骨作薪,丐器之成,遽跃入火。翌日启窑,果得完器,自是器无弗完者。家人收其余骸,葬凤凰山。相感其诚,立祠祀之,盖距今百数十年矣。”明代以来,景德镇瓷业祀奉童宾为窑神,有庙祠,还有相应的祭祀活动。[8] 不难看出,这正是冶炼业以人作为牺牲的古老习俗在陶瓷业的流变。

在浙江缙云一带,烧炭人祀奉老相公为烧炭鼻祖。当地有传说,说老相公祖籍桐庐,人很邋遢,一只脚是烂脚,和他娘舅一起烧炭。一次,他故意把自己堵在柴窑之中出不来,而催他娘舅点火。这窑炭烧了三天三夜,出窑时只见老相公已成为一个浑身发红的火人,却还在说话。据说他从此升了天。旧时,烧炭人上山搭好炭棚之后,就要举行“接老相公”和“拜土地”的祭祀仪式,以后,每逢初一、十五,都要祭祀这两个神灵。[9] 在这里,传说的变异似乎更大些,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以身投炉作为牺牲这种古俗的残存。

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工匠文化史上,工匠以身投炉作为牺牲的民俗传承是占有着重要地位的。迄今我们所读到最早的典籍记载之一,就是《吴越春秋》中的“莫耶投炉”,而这又是和春秋晚期吴越一带的铸剑生产联系在一起。

二

我们接着要讨论的另一种冶炼生产民俗叫做“衅”,有关它的一段记载也保存在《吴越春秋》卷4“阖闾内传”中。文云:

阖闾既宝莫耶,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作钩者甚众,而有人贪王之重赏也,杀其二子,以血衅金,遂成二钩,献于阖闾,诣宫门而求赏。王曰:“为钩者众,而子独求赏,何以异于众夫人之钩乎?”作钩者

曰:“吾之作钩也,贪王之赏而杀二子,衅成二钩。”王乃举众钩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钩甚多,形体相类,不知其所在,于是钩师向钩而呼二子之名:“吴鸿、扈稽,我在于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声绝于口,两钩俱飞,着父之胸。吴王大惊,曰:“嗟乎!寡人诚负于子。”乃赏百金,遂服而不离身。

这个传说真实与虚构并存,曲折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风貌,说明“衅”作为一种冶炼工匠民俗是确实存在着的。

据典籍记载,春秋时期盛行衅礼,凡新造建筑物和大小器物,必用人血或禽兽血涂在一定的部位。《孟子·梁惠王上》:“将以衅钟。”赵岐注:“新铸钟,杀牲以血涂其衅隙,因以祭之,曰衅。”孙《孟子疏》:“古者器成而衅以血,所以厌变怪,御妖衅。衅钟谓之衅,亦治乱谓之乱之类也。”也就是说,衅的本意是事端、间隙、暇隙、破绽一类,用血来涂器物的缝隙处,以祛祟驱妖,对付这个“衅”,于是把这种行为方式也叫做“衅”。《史记·高祖本纪》:“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则说在祭蚩尤的仪式上,是要用血来涂抹鼓和旗的。《礼·乐记》:“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疏:“言车、甲不复更用,故以血衅而藏之。”这里说当战车、盔甲一类器物不再使用而放进府库时,也要用血涂抹,以示避邪驱妖。除此之外,大凡卜器、祭器、礼器、乐器、军器、庙主社主、学教用器、宝物古物,以及厩、宗庙、祭坛、仓库,也一概要用血来涂抹。据江绍原先生研究,今人的贴红纸、挂红布,也许就是古代衅礼的遗风。[10]

此类衅的民俗,从文化心理上分析,当起于先民对血的崇拜,或者说是对于血的迷信。在南印度的一些村落里,当霍乱或其他瘟疫流行时,就要择日祭祀女村神,掘地为坎,杀一头牛,将牛的脏腑和血放在坎中,并严加看守,不让旁村的人偷取。同时又取一些牛血和脏腑,拌以米饭,承以新筐,由一个一丝不挂之人顶在头上,绕行本村农田,随时将筐中的血、脏腑、饭洒在田界上,以为可以保护这一带,使邪恶不敢进入。而在南印度的另一些村落里,在宰牲吃肉时总要用布条浸在血中,然后取出挂在屋檐上,以为可以保护牲畜不生病。在古代非洲,则有喝敌人的血的习俗,以为可以借此夺取敌人的生命力来强壮自己。[11]

以为血代表生命,血中蕴藏着人的灵魂,这种观念恐怕在1万8千年前的山顶洞人那里就已经萌生。考古发现,山顶洞人会在死人身躯四周洒

上一些红颜色的矿物质。人类学家猜测,山顶洞人或许发现人的死亡与体内血液的消失有关,并就此以为生命就在血中。他们在死者身躯四周洒上红颜色的矿物质,正是为了试图用这种类似血的物质来促使死者身体里的血液再度出现,从而恢复生命。正是这样一种巫术的理念,导致山顶洞人形成了这样一种丧葬习俗。

《吴越春秋》所记载的“血衅金钩”传说,在文化心理上和山顶洞人对血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可以说和前述南印度人和非洲人对血的认识也十分相似。他们都以为血有灵性,血象征着生命力,血就是人的灵魂,血有驱赶妖邪的功能。在历代典籍中,“血衅金钩”一类的传说记载并不多见,后世出现得较为频繁的则是工匠们使用厌胜巫术的种种记载。据此,《吴越春秋》的这段文字也就更加值得引起注意。

三

以上,我们提到了春秋晚期吴越一带冶炼工匠中流行的两种民俗,一是以身投炉的“人殉”,一是以血涂物的“衅”。这两种古老的生产民俗在后世都已经消亡,前者只保存在口头传说和民间信仰中,表达出人们对那种为大众利益而牺牲生命的英雄主义精神的崇敬;后者则嬗变为贴红纸、挂红布一类行为方式,后人的理解则往往偏重于吉祥和喜庆,而早已把它那祛崇驱邪的原始意义忘记得一干二净了。这是许多民俗文化的必然走向,不必奇怪。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对这个历史时期里的文化事象有所认识和把握,仍属必要。

我们知道,巫术和原始宗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在他们的文化历程中可以没有巫术和原始宗教。从这一点上说,人殉和衅并非只存在于吴越一带。但是,《吴越春秋》中这两段文字记载的出现,又绝非偶然,这是与这个地区的地域文化背景相一致的。

《列子·说符》云:“楚人鬼而越人。”张湛注:“ ,祥也。信鬼神与 祥。” 祥,一指祈禳,一指吉凶的先兆,都属于信仰民俗。可见越地的民间信仰历来十分发达并引起中原人的注目。《越绝书》卷8云:“巫里,句践所徙巫为一里,去县二十五里。其亭祠今为和公群社稷墟。巫山者,越魍,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县十三里许。”说明春秋时的越国巫风极盛,有专门给巫住的地方,有专门葬巫的山。同书卷8又云:“江东中巫葬者,越神巫无杜子孙也。死,句践于中江而葬之。巫神,

欲使覆祸吴人船。去县三十里。”可见句践认为神巫的子孙死了以后,仍然具有巫术力量,可以颠覆吴国军队的战船。诚然,巫是巫,工匠是工匠,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春秋晚期越国的巫风之盛,却由此可见。国王勾践信巫,国中的巫有很大势力,这必然会影响到工匠,这是可以想见的。

越巫名声之大,不仅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继续保持到了汉魏六朝。《史记·封禅书》云,汉武帝“令越巫在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上行下效,焉得不盛!汉应劭《风俗通义》则如实记载了当年越地的巫风危害,文云:“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赋敛受谢,民畏其口,惧被崇,不敢拒逆,是以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又说“武帝时迷于鬼神,尤信越巫”。应劭是河南人,做过泰山太守,用一个中原人的眼光来看越文化,觉得会稽一带的“淫祀”实在太严重,已经危害到国计民生了。凡此种种,都说明越文化中的信仰民俗十分活跃而颇具个性特征,曾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认识这样一个地域文化背景,我们就更会感受到《吴越春秋》中这两段文字的厚重分量,同时也就有可能对春秋晚期吴越一带冶炼生产中的民俗事象及其文化心理有一个恰当的把握。

参考文献:

- [1]金永平.干将、莫邪的传说及演化[A].国际百越文化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2]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27-232.
- [3]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1.173.
- [4]马昌仪.中国灵魂信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6.
- [5]郑振铎.汤祷篇[A].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6]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14.
- [7]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120-121.
- [8]余悦,等.江西民俗文化叙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162-163.
- [9]胡必法.缙云南乡的烧炭民俗[A].顾希佳.山里人的生活——浙江山区民间文化调查[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10]江绍原.古代的“衅”(涂血)礼[A].江绍原民俗学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 [11]江绍原.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A].江绍原民俗学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下转第89页)

明奠定了基础。伴随着各类学校的建立, 京师出现学子云集的盛况: “四方儒士, 多抱负典籍, 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 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篋而升讲筵者, 八千余人, 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 古昔未之有也”。^[2](同上) 京师六学作为中央官学的主体, 体现了唐前期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兴盛, 同时也使我国的文化重心长期稳定在北方。

唐前期, 南方文化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长江流域的苏、杭、扬、常、越、襄、益等州表现较为明显, 但与北方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南方文化的勃兴是在唐后期的安史之乱以后。

参考文献:

[1] 王会昌. 中国文化地理[M]. 武汉: 华中师大出版社, 1992.

[2] 刘昫, 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3] 杜佑. 通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4] 王定保. 唐摭言[M].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5] 陈正祥. 中国文化地理[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3.

[6] 房玄龄, 等.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7] 李延寿. 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8] 魏征, 等.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9] 田廷柱. 隋唐氏族[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0.

[10] 颜晨华. 经学传统与汉唐北方士族的盛衰[J]. 学术月刊, 1991, (7).

[11] 董诰, 等.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2] 欧阳修, 等.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3] 吴兢. 贞观政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4] 胡震亨. 唐音癸签[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5] 冯小林. 隋唐五代教育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The Distribution and the Cause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 about Culture in the Earlier Stage of Tang Dynasty

KANG Bao-ling

(History Depart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field, there were many achievements about the culture research of Tang from the time angle of view, but the research from the space angle was very weak.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depends not only on time, but also on space. I try to extend the field of vision in this article, and analyze the whole prospect of the culture in the earlier stage of Tang, especially inspect the distribution and the cause of center of gravity about culture in China.

Key words: the center of gravity about culture; the center of culture; the noble culture

(责任编辑: 沈松华)

(上接第 59 页)

On Smelting Folk Custom of Wu Yue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GU Xr-jia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book of *Wu Yue Chun Qiu*, the writer holds that there existed two kinds of folk customs “人殉” (people as the sacrificial object) and “衅” (smearing blood) in Wu Yue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is paper approaches to the original causing and the later changes of these two folk customs. It also points 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gion and culture which caused such kind of customs.

Key words: Wu Yue culture; folk custom; people as the sacrificial object; smearing blood

(责任编辑: 沈松华)